

陸明華 2013

磁州窑瓷器烧造相关问题的认识

磁州窑瓷器烧造相关问题的认识

上海博物馆 陆明华

内容提要：磁州窑是中国古代烧瓷名窑，产品远销海内外。本文主要就磁州窑的一些相关情况和现象进行一般性叙述。如磁州窑的官瓷烧造，涉及明清两代北方民窑中官用瓷烧造的情况。关于磁州窑瓷器的社会影响，主要从社会需求和收藏两个角度切入。烧造工艺传播方面，则从对周边地区的传播、对海外的传播和对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影响这三个方面予以剖析。最后的“从磁州窑到磁州窑系”这一分题，着重对目前国内存在的关于“窑系”的看法谈一些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磁州窑 官用瓷器 社会影响 工艺传播 磁州窑系

Abstract: Cizhou Ware was an important ceramic ware in ancient times, whose products were popular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focuses on general topics of the ware and discusses related questions and phenomena. First, the paper explores Cizhou imperial wares, and probes into civilian kilns' production of imperial wares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n, it discusses the influences of Cizhou ware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demand and collection. As far as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are concerned,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their influences on neighboring and overseas kilns, as well as on Jingdezhen blue-and-white ware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The last chapter "From Cizhou Ware to Cizhou Ware Series" provides the authors opinion on "ware series", which is under discussion nowadays in China.

Key words: Cizhou Ware, imperial porcelain, societal influence, transmission of manufacturing technique, Cizhou Ware Series

磁州窑是宋元明清时代北方地区的重要民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较大的影响。许多年来，国内外不少古陶瓷专家学者对磁州窑及其烧造瓷器有较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当然，由于出土资料和研究证据等因素，过去对磁州窑及其作品的研究依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整体上看，成果是显著的。值此磁州窑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笔者拟就几方面相关的内容，谈一些自己的认识。

一 磁州窑与官用瓷器

在历史上，磁州窑一直被认为是十分纯粹的民用瓷烧造窑场，其产品有着百姓喜闻乐见的风格和浓厚的民间色彩。自明初有记载“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1]以后，磁州窑逐渐为世人熟知。但这一窑区也曾作为官府的基地而存在过，而且时间相当长。

磁州窑瓷器成为官用产品基地主要是明清时期的事，宋金元时代磁州窑是否有真正的官用瓷基地，实际上我们现在并不十分清楚。但宋金北方瓷器的官方和军方使用痕迹还是存在的。过去认为最典型的河北鹿泉宋墓出土的“天威军官瓶”应是金代磁州窑的产品，但现在已被当地有关专家认为是河北井陘窑烧造（图一）^[2]。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金“正八”龙瓶有可能是反映官方身份的作品（图二）。“正八”的含义一直不太清楚。笔者认为“正八”的含义是指的官员品秩，应该是“正八品”，古代文献中记录“正八品”的很多，如金代文献记录：“正八品，同管勾；从八品，总掌察左右司，旧二员，正大省一员。”^[3]过去笔者曾认为这件“正八”款龙瓶是磁州窑烧造，但有专家认为是扒村窑烧造，应该是正确的。

另外，在河南的民窑窑场里，发现有“京西转运判官贡奉酒”瓶（图三）和“省符”瓶等瓷器（图四），前者系出土物，现藏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后者为私人收藏的磁州窑风格梅瓶。在汉代—明代的文献中，较多见到“省符”二字出现。“省符”有特定的涵义，如唐代宫廷向尚书省所下达的命令中有“凡制刺计奏之数，省符宣告之节，率以岁终为断”^[4]。

看来宋金时期与磁州窑产品风格接近的窑场生产官府用品一定有不少。但能够明确宋金元时期与磁州窑有关的官瓷却难以明确举证。当然，有些写有款识的磁州窑或磁州窑类型瓷器是可以作为官方见证的，如写有“八仙馆”文字的酒瓶，北宋汴京确实有“八仙馆”，其地在“寿山艮岳”。

寿山艮岳在汴城东北隅，徽宗所筑，初名凤凰山，后改寿山艮岳。周围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山之东有萼绿华台……书馆、八仙馆^[5]。

作为徽宗享受生活的名胜之地，这里可谓风光无限，而八仙馆就坐落于此。磁州窑有“八仙馆”落款酒瓶，1982年，笔者在安徽萧县文管所也见有“八仙馆”款酒瓶，系白土窑烧造（图五）。虽然书有“八仙馆”的磁州窑风格瓷器不一定全是宋徽宗“寿山艮岳”之“八仙馆”定烧，但“寿山艮岳”的“八仙馆”定烧磁州窑风格的生活用瓷器则完全可能。

当然，“寿山艮岳”区域内的“八仙馆”不是唯一冠有此名的独家馆舍，其他地方也有，如金末元初的南京也有“八仙馆”。金元时人刘祁记述：

初召至南京时,屏山亦在,余每从之游。乱后余居八仙馆,与飞卿相迹日相见^[6]。

此“乱后”不是指“靖康之乱”,而是金末之战乱。此八仙馆是指驿馆。安徽萧县距南京不远,磁州窑或白土窑为这里的“八仙馆”定烧瓷器都不是不可能的。

在磁州窑或磁州窑类型瓷器上书有驿馆名,也应与官方有关,虽然驿馆这种官方或半官方机构的地位较低,有的可能与朝廷没有太大关系,是官府的商业机构,可说只是多少有些关系。如“仁和馆”也是其中一例,古代官方在旅途设立驿站,是传递文书、官员过往、中途暂息和住宿之地。驿站的客舍被称为驿馆,专供沿途过往的官员住宿。不少驿馆冠以地名,如“仁和馆”即是,如明陈眉公谓:“余秀州买得白定瓶,口有四纽,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7]故宫博物院有藏(图六),安徽濉溪大运河遗址也有出土(图七)。文中所说的仁和馆,应指南宋时期临安的驿馆,



图一 金井陘窑“天威军官瓶”铭文瓶(河北鹿泉宋墓出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图二 金扒村窑黑釉“正八”龙纹瓶(上海博物馆藏)



图三 金“京西转运判官贡奉酒”瓶标本(河南出土,河南省考古研究所藏)



图四 金“省符”瓶(私人收藏)



图五 元“八仙馆”四系瓶(萧县博物馆藏)



图六 金“仁和馆”瓶(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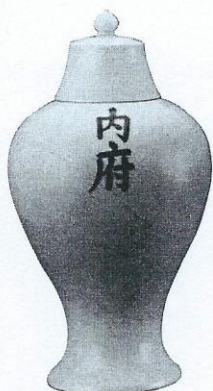
图七 金“仁和馆”瓶(安徽濉溪大运河遗址出土,淮北博物馆藏)

南宋时期有地方文献记载：

仁和馆，在清湖闸之东。绍兴十九年，郡守汤鹏举建^[8]。

在传世品中，还有不少书写“内府”二字的瓷质梅瓶，除了少数景德镇的青花款器和白釉铁彩款器外（图八、图九），还有施孔雀绿釉的器物（图一〇），这些都是景德镇御窑提供的优质制品，其烧造年代均为明代。

目前所见的绝大多数“内府”款瓶是具有磁州窑风格的作品，有的明确把这样的器物定为磁州窑烧造，只是时代定为元代或明代。国内外有不少这样的收藏，如故宫博物院（图一一）、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一二），爱知县陶磁资料馆等也有这样黑釉罐作品收藏，白釉褐彩文字瓶时代被定为元代，黑釉罐定为明代磁州窑类型烧造^[9]。还有真正可肯定在磁州窑烧造的“内府”款瓶在河北观台窑窑址被发现过，原件藏河北省磁州窑博物馆^[10]（图一三）。在国内外还有不少地区见有这样的作品出土和收藏（图



图八 明初景德镇窑青花“内府”瓶（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



图九 明景德镇窑白釉铁彩“内府”瓶（南京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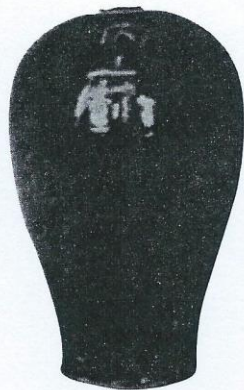
图一〇 明景德镇窑孔雀绿釉“内府”瓶（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



图一一 元—明“内府”白釉瓶（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二 元—明“内府”瓶（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一三 元—明“内府”瓶（观台磁州窑窑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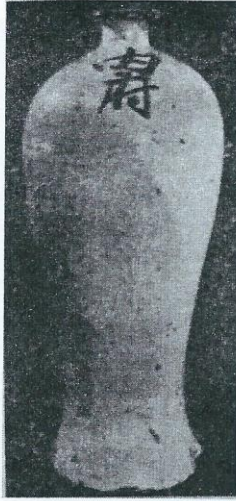
一四、图一五、图一六、图一七、图一八)。

另外,还有在器身书有褐彩“内酒”的白釉瓶,安徽六安出土了一件这样的作品^[11],此器烧造年代可能晚至明代,“内酒”二字有可能是“内府酒瓶”之意,与通常所见“内府”款瓶含义相同。这种落款的器物,目前笔者仅见到这一件。

明清时期的磁州窑依然大量烧造瓷器。据记载:

(洪熙元年九月)己酉命行在工部于江西饶州府奉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祭器,于磁州造赵王之国各坛祭器^[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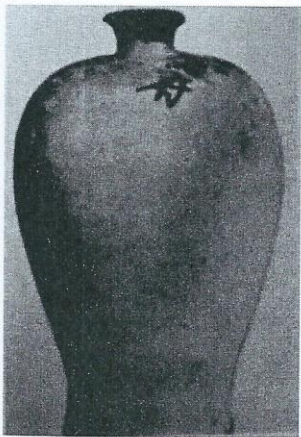
这一段文献,如果分开阅读,后面的“于磁州造赵王之国各坛祭器”,是否烧造



图一四 元—明“内府”瓶 (北京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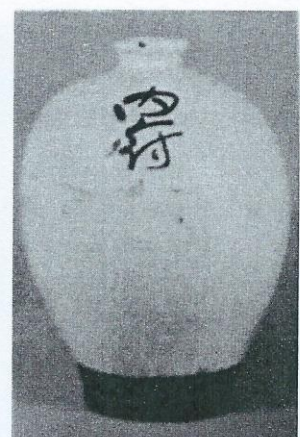
图一五 元—明“内府”瓶 (北京后英房出土)



图一六 元—明“内府”瓶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七 元—明“内府”瓶 (河南私人收藏)



图一八 元—明“内府”瓶 (日本私人收藏)

瓷器尚难肯定，但与前面的一段记录连起来，就可肯定是为赵王府定烧瓷器。清人所编《明史》完全按照这段史料抄录：

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祭器，磁州造赵府祭器。

现在，我们无法知道当时的磁州窑烧造了哪些品种的瓷器，但可以了解烧造的是赵王府的“各坛祭器”。这在规格上与皇家的祭器烧造可能无法相比，明代早期，皇家通常使用景德镇官窑和龙泉等官用窑场产品，器物均颇为精美。同时，对此次王府祭器烧造的感觉是明朝的等级森严，分封于河南彰德府的朱姓赵王要使用就在封地烧造的瓷器，也要得到朝廷同意烧造后拨给。这似乎说明，当时有专门的官方定点烧造窑厂。

另据明代官方文献记载：

内府供用库每年该用磁坛一千五百个，光禄寺每年该用缸、坛、瓶共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个只，俱分派河南布政司并直隶真定府烧造，河南彰德府每年造瓶、坛、缸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四件，钧州每年造瓶坛缸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三件，直隶真定府曲阳县每年造瓶、坛、缸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四件，俱送光禄寺供用^[13]。

以后增修的文献也提到了磁州窑等的官用瓷器，具体到产品的折价：

嘉靖三十二年题准，通行折价，每缸一只折银二钱，瓶坛一个折银一分。钧州缸……磁州缸七十三只，瓶坛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二个，共该银一百七十二个，共该银一百七十二两二钱二分，外增脚价银一百三十二两五钱八分五厘。曲阳县……通行解部，召商代买^[14]。

明吕坤《停止砂锅潞绸疏》：

织造、烧造，各有地方岁解岁停，各有匹件载在会典可考而知。已查得陶器烧造地方，止有仪征、瓜洲、河南、正定、江西五处。其器物止有瓶、坛、瓷瓮等件^[15]。

清代也有相关文献记载：

陶器，顺治初年，定正定府曲阳县岁征瓷坛折价并水脚银……解部移送光禄

寺。三年，定河南省岁解本色瓷坛六百，在磨一副，交部备用。八年，题准外解瓷坛改折召买……^[16]

上引《明会典》所记，为明早中期之事；增修的《大明会典》依然属于明代；而吕坤所述，亦为嘉靖时期之事；至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录为清代早期之事，可见明代乃至清初，河北只有曲阳县是官用瓷业基地。几乎没有其他地区的相关信息。但实际上，《明会典》已出现“河南彰德府每年造瓶、坛、缸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四件”等内容，因此，磁州在明代属河南管辖并烧造官方用瓷应是众所周知的事。

有关正史记载：

彰德府散下宋相州邺郡，彰德军节度治安阳。天会七年，仍置彰德军节度。明昌三年升为府。以军为名，户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县五，镇五，安阳……汤阴……临漳……磁州……^[17]

磁州在府城北七十里，本秦邯鄲郡地。汉为魏郡，武安县地。后魏析置临水县。后周割临水，置滏阳县及成安郡。隋罢郡于滏阳，置磁州，后罢。唐改为惠州，后复为磁州。宋以昭义县省入滏阳。元初升为滏源军节度，属广平路，后复为磁州。本朝并省滏阳县入焉，及改今属，编户四十一里，领县二^[18]。

稍晚的明代官方文献也概括了当时彰德府所辖地区：

彰德府，领州一，县六：安阳县、汤阴县、临漳县、林县、磁州、武安县、涉县^[19]。

清代的史料记述得更具体：

磁州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东西距一百五十五里，南北距八十里。东至成安县界五十五里。西至河南彰德府涉县界一百里。南至彰德府安阳县界三十里。北至邯鄲县界五十里。东南至彰德府临漳县界四十里。西南至彰德府林县治一百八十里。东北至邯鄲县治七十里。西北至彰德府武安县治九十里。……隋开皇十年于县置磁州……明洪武初省滏阳县，入州属河南彰德府。本朝雍正四年改属广平府^[20]。

以上历史文献已明确记录或证明明代和清早期的磁州窑是官方烧造基地，主要烧造瓶、坛、缸、瓮等器物，这些器物，就是民国以来常说的彭城窑大件器。当然现在

能肯定的明代和清早期官用磁州窑瓷器中，只有那些可肯定为磁州窑烧造的“内府”款梅瓶（这些器物过去多定为元代，看来基本上是明代产品），还有许多没有经过确认。这些器皿，大多数是日用器如酒瓶、酒坛和水缸之类。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地方志也已十分明确记载了当时的磁州有官窑烧造：

彭城厂在滏源里，官窑四十余所，岁造磁坛，纳于光禄寺^[21]。

“滏源里”为小地名，磁县西部彭城镇滏山南，是滏阳河的源头，“滏源里”显然有此含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确认官方的“彭城厂”在什么位置，也没有考古发掘证明肯定“彭城厂”的实际存在情况及其性质，只在彭城镇。当然，这种“官窑”是为皇家烧造实用器具的窑厂，其性质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明清官窑只有用途、风格和水平上的区别，似无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否像景德镇御器厂那样有独立的窑厂现在还不清楚，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这样明确的窑厂。

可以说，在古代把瓷器作为酒瓶、酒坛和水缸等日用品使用，这应该不是普通的民间用途了。古往今来，民间使用的酒瓶、酒坛等器具绝大多数是所谓“缸胎”陶质制品，直至现代，这种“缸胎”酒瓶、酒坛几十年前依然在使用（当然，现在新制作的多半是复古倾向的产物）。古代能经常使用有彩绘装饰的瓷质储酒器者，可能更多的是有身份的人。因此历代磁州窑或类似磁州窑风格的储酒器的使用，上至宫廷，下到官僚文人阶层，一般较少会在平民百姓家和市井中广泛使用，因为这种器物的价格比一般的“缸胎”陶质制品储酒器要昂贵许多。而官方对日用酒器的把关，肯定不如对景德镇官窑瓷器那样严格。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磁州窑风格大型器具内，一定有明清时期烧造的官用酒器。

二 磁州窑瓷器的社会影响

磁州窑瓷器的社会影响不是一朝一夕造成，而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后逐渐形成的。在宋金元时期，庞大的窑区烧造，产品的运输近销，磁州窑瓷器的民间影响必然很大。但由于这是一种民窑产品，可能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文人笔记中几乎没有关于磁州窑瓷器的记载，明代的陈继儒认为，斜书“仁和馆”三字的瓷瓶，是定窑所烧。但这实际上还是磁州窑类型的产品。清代的瓷器赏玩风气，应与晚明相似。而文献中关于磁州窑的记录，也只是引用明代《格古要论》的记载。

从有关文献记载看，磁州窑在清代以前确实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论河北瓷器，往往只有邢、定二窑。清代相关文献引述说：

《唐书·地理志》：邢州土贡瓷器。《宋史·地理志》：邢州贡白瓷盏。《金史·地理志》：正定府产瓷器。《定州志》：瓷器珍于天下，江南好事者往往蓄之，索诸定蔑如也。《磁州志》：彭城镇烧造瓮、缶、盆、碗、炉、瓶诸种，有黄、绿、翠、白、黑各色，然质厚而粗，只可供市肆庄农之用^[22]。

当然，这里有区域划分的问题，磁州曾为河南彰德府管辖，后来才归河北，有的地方志是根据当时修志时间划分的，因此会把磁州窑与邢、定等窑连接在一起叙述。

清末民初，磁州窑瓷器逐渐受到世人的重视，特别是民国早年在河北巨鹿古城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磁州窑和类似风格陶瓷器以后，磁州窑产品逐渐为世人熟知。以后陆续开始有人收藏磁州窑瓷器。

民国时期，许多磁州窑和同类风格的陶瓷器被贩运到了国外，如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都有不少收藏。特别是在日本，磁州窑风格的瓷器受到了很大的欢迎，日本人似乎对白地黑花和剔刻等装饰风格的瓷器有一种特别的爱好。在日本的许多公私博物馆和美术馆里，不同程度地收藏着磁州窑和相似风格的陶瓷器，其中不乏精品。

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些风格清新而质朴自然的作品，逐渐受人关注。过去在皇家陶瓷器收藏中难以入流的民间风格瓷器，在这时候已经成为不少博物馆和收藏家关注的目标。国内的大博物馆开始大量征集陶瓷类文物，如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都征集到了许多磁州窑和类似风格的陶瓷器。另外，上海的一位收藏家，收藏的磁州窑及相似风格的陶瓷器，几乎占据国内收藏的半壁江山。

1989年，笔者在香港第一次看到了收藏家杨永德先生的大批包括磁州窑产品在内的陶瓷枕，那是在中文大学文物馆。后来，在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又看到了这批作品，为杨先生的捐赠，使这批总数达200多件的陶瓷枕成为这家博物馆永久的收藏品。200多件陶瓷枕不是一个小数目，国内外有不少大中型的博物馆，但收藏陶瓷枕数量达到200件的似乎还很少。因此，这是一种收藏的意识，杨先生的收藏意识，最终提高了南越王墓博物馆在另一领域的知名度。

近一二十年来，磁州窑瓷器的收藏地位已越来越高，现在的人们早已摒弃固有的民窑产品质量低劣的陈旧意识，把磁州窑精品视为可与历代官窑产品媲美的器物，成为收藏的重点。

当然，磁州窑瓷器的社会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收藏方面，影响的存在不仅仅在于谁收藏了磁州窑瓷器，而是由磁州窑瓷器本身的艺术魅力所决定的，因为，磁州窑瓷器的艺术水准虽不能说可与历代官窑和其他民窑相并列，但它那独特的装饰风格使人感到它并不逊色于其他民窑瓷器。更重要的是，磁州窑瓷器的装饰工艺提升了它自己的社会地位。

三 磁州窑瓷器工艺技法的传播

宋元时期磁州窑瓷器的装饰工艺，是当时国内民间艺术的典范之一。也可说它代表了一个时期民族工艺的艺术水准，由于这种装饰工艺的多元化和独特的艺术性，磁州窑瓷器工艺技法得到广泛传播。

1. 对周边地区的传播

磁州窑瓷器制作工艺是否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这看来是必然的，因为在北方地区有许多窑场烧造与磁州窑瓷器工艺相仿的产品。笔者曾经这样思考：难道只有磁州窑瓷器工艺影响其他地区，就没有其他地区影响磁州窑吗？实际上，这也是十分可能的，在古代，烧瓷技法的传播不应是绝对的，这里的烧造技法，可以影响到其他地区，其他地区的技法完全可以影响到这里。但磁州窑是一个重要产瓷区，烧造内涵十分丰富，因此，把它看做民间装饰瓷器的“龙头老大”是十分自然的。

当然，就周边地区而言，整个磁州窑产区，实际上与它们息息相关，现在版图上的磁州窑，其实与河南距离最近，和山西相去不远，离河北本土的一些窑区也较近。如果说，历史上（确切地说是宋金元时期）的磁州窑是北方民间窑业釉彩装饰工艺最有特色的瓷窑的话，那么，周边地区的不少窑场呈辐射状，是接受了磁州窑烧造的影响，许多工艺技法被吸收到当地，烧造具有磁州窑风格的产品。这些地区，北有内丘、临城、曲阳、井陘等许多地区，南有河南的广大产瓷区，西到山西的辽阔地区，东面则有山东的大量窑区。从发展的情况看，河南地区可能是对磁州窑吸收交流最多也是最广泛的，因为越往南，就越繁荣，河南开封是北宋的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金代的多个帝王，曾以汴京为首都或陪都。以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一带的经济文化一直相对繁荣，窑业十分发达。其次应是山西，遍查山西烧瓷窑场，有大量地区曾烧造磁州窑风格的瓷器。而往北的内丘、临城、曲阳、井陘等窑，都见有烧造磁州窑风格的产品。据山东的研究者说，山东地区除了胶东、鲁北和鲁西南以外，其他地区几乎均有磁州窑风格瓷器发现，分布范围之广泛，出土数量之多，可能是其他窑口无法比拟的。

2. 对海外的传播

磁州窑瓷器制作工艺的海外传播情况，我们可列举邻近的朝鲜半岛。高丽青瓷是11～12世纪崛起的第一个外国仿中国瓷器新颖产品，它充分吸收了汝窑、越窑的制作工艺，当然还包括定窑。最终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汝、越等窑风格接近但不完全相同的青釉瓷器。北宋徐兢谓：

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酒尊之状如瓜，上有小盖，而为荷花鸭之形，复能作碗、碟、杯、瓯、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俊猷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

余则越州古秋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23]。

这里，他提到了汝、越、定等窑瓷器，唯独不提磁州窑，实际上，磁州窑瓷器对高丽青瓷的影响不小。像徐兢这样的官僚文人，在朝鲜半岛接触的是上流社会，他对汝、越、定诸窑瓷器较为熟悉，对磁州窑器物也许了解不多，也可能未接触到高丽青瓷中的镶嵌青瓷。这种瓷器，实际上是受到磁州窑瓷器装饰影响的。在许多高丽镶嵌青瓷上，可明显看到磁州窑瓷器工艺的影响。当然，由于是青瓷，我们看到的不是完全相同的磁州窑风格产品，但从基本装饰风格看，它那脱胎于磁州窑瓷器的基本状态清晰可见。另外，李氏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年）烧造的所谓“粉青沙器”也与磁州窑类型瓷器烧造工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据国内有关专家总结，这种施化妆土的“粉青沙器”有六个品种：镶嵌、印花、雕花、剥地、铁画、粉妆纹。而它与磁州窑相关的工艺主要有划花法、剔花法、剔花填黑法、珍珠地划花等^[24]。

至于青釉黑彩或青釉褐彩的工艺，朝鲜陶工也是吸收了磁州窑相关彩绘工艺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少所谓“绘高丽”的朝鲜瓷器产品上，可看到磁州窑釉下彩的影子。

这种所谓的“绘高丽”器具，明代以后在日本也大量生产^[25]，其源头实际上还是中国的磁州窑。

3. 对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影响

过去都认为，磁州窑和吉州窑瓷器工艺，对元代景德镇瓷器工艺的影响十分大。现在看来，磁州窑工艺技法对元代景德镇瓷器工艺的影响极大，而吉州窑则并不太明显。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情况看，金人入侵，对吉州窑制瓷工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白地黑花瓷器，正是由于磁州窑工艺技法的传播，才使吉州窑白地黑花、白地赭花和黑地、赭地白花瓷器装饰工艺流行。而天目黑釉瓷的流行似乎也不完全因为南方福建有天目瓷。因为磁州窑和相同类型的瓷器中也有黑釉及带有装饰的制品。在南宋时期，江西景德镇也没有因为受到磁州窑的影响而出现与之相似纹样装饰风格的瓷器，依然生产与北宋风格相同的青白瓷。整个两宋时期，景德镇始终烧造自己所创的青白瓷产品，南宋时期的青白瓷只是在工艺方面提高，当地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品种。如果说景德镇吸收国内窑场烧造技法的话，主要只是吸收了定窑的工艺技巧。

而元代的景德镇对磁州窑工艺的吸收和模仿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青花瓷器。当然，在青花瓷器出现以前，磁州窑就已经对景德镇制瓷工艺产生影响了。关于这方面，笔者已在2009年由中国古陶瓷学会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元青花瓷器研讨会上提出相应的观点^[26]，不少专家也持有基本相同的看法。另外，据景德镇人士介绍，近期在景德镇地区发现有器表施化妆土的红绿彩瓷片，为当地烧造之物，从这中间可看出南北方瓷器烧造的渊源关系。

四 从磁州窑到“磁州窑系”

从地域上看，磁州窑不是一个简单的窑场，它不像历史上那些单个的窑场，而是有一大批窑场组合起来的总称，因此，磁州窑本身就是一个多元风格的窑系。从以往的发现情况看，我们提得较多的磁州窑窑区有峰峰矿区、彭城、东艾口村、冶子村，还有观台和磁县等。实际上，另外还有不少这样的烧瓷窑区，如北贾壁、青碗河、青碗窑、南莲花、荣花寨、申家庄，还有彭城附近的临水地区等。2003年，笔者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磁州窑瓷器研讨会，会议展示的临水窑瓷器整体水准不低，在此之前，我们甚至不清楚临水窑是和彭城窑是隔河相望的磁州窑窑场之一。在上面提到的这一较庞大地区内，估计以后还会发现窑场。所以说，磁州窑是一个地域广袤、内涵丰富的大窑区概念，大窑区与单一瓷窑的情况不太相同，这中间有些窑场与窑场中间生产的瓷器品种、质量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由于区别细微，除了部分专门研究磁州窑的专家外，通常难以分别，基本上一律以磁州窑命名。实际上其间有些能够区分的，对这种可分者还是应予区分，就好比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分出它的文化和类型。我们对发现的磁州窑产品，能区分的应尽量区分，只要我们坚持这样做，到一定的时候，就可能把磁州窑产品的基本地域和许多不同窑场产品的不同风格搞清楚。

再说“窑系”，这个概念是近20年前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先铭先生提出的。中国陶瓷史上分六大窑系，“磁州窑系”是其中之一。关于六大窑系的确定和有关情况，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这里不再赘述，但由于这其中的“磁州窑系”涉及本文叙述的情况，因此在这里稍加阐述。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历史条件下，“窑系”说有其一定的作用，因为这牵涉到中国古代许多瓷器窑场的归类问题。就以磁州窑为例，这一窑场是多元化的烧造窑场，其中的品种十分丰富。但是，磁州窑烧造的诸多品种，不仅在邻近的不少地区如河南、山西、山东等地都有烧造，而且还在陕西、安徽、广东等地的窑场中有烧造。各地相似风格瓷器烧造之多，实在令人难以用一个合适的名称来归纳。因此，运用“磁州窑系”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名称，在当时来说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十分合适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单单以“窑系”来概括全国各地这么多烧造相似品种的窑场和瓷器，确实是不完全了。当然，我们如何采用一个新的规范用词来概括并代替“窑系”这样一个概念，的确颇费思量。这需要从综合思路来考虑，把过去的六大窑系联系起来，因为“磁州窑系”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一个联合体，上面有众多分支。现在有的专家避免套用窑系的概念，而是审慎地运用其他提法。这未尝不可，但看来这也不是一个最终的典型名称。

无论是“磁州窑系”还是其他的冠名，在一定意义上说，作为一个民间瓷窑，磁州窑还是沾光的。人们为什么不以扒村窑或当阳峪窑作为代表性名称？这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古到今，磁州窑名声远播；另一方面，传世瓷器多。早在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就已提到磁州窑，先入为主，人们心目中其已有地位，其他窑场产

品的发现和认定,都显得孤单而缺乏代表性。有时看到的瓷器不一定是磁州窑产品,即使不认识,姑且放在磁州窑也无妨。因此,可以认为,磁州窑的先天条件优越,不管是谁研究这样类型的瓷器,都要与磁州窑相联系。当然,这不是盲目地跟风,首先必须是有这样的根基,磁州窑是一个品牌,而且更有实力。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烧造的产品确实是有特点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明清时期,磁州窑不仅继续大量烧造民用瓷器,还曾作为官方的烧造基地,生产过许多官用器具。否则,人们不会把它看做民间制瓷艺术的代表,也不会有人用“磁州窑系”或其他名称来概括历代的相似艺术风格的产品。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摒弃“窑系”的概念,就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名称取代它。当然,废除被认为是不尽合理的旧名,创立更有概括意义的新名看来不是十分容易的。你要改变这样的名称,必须有一个真正站得住的让学界广泛接受的称呼,否则,难以令人信服。似乎可以认为,在没有合适名称的情况下,还是以不变为好。就好比前一阶段江苏无锡鸿山大墓发现大量青釉制品,浙江德清发现产品与之相吻合的战国青釉器窑场后引发专家学者探讨时,有关学者提出要改变原始青瓷之名一样。不合理但需要大家认可,在无法统一的情况下,依然保留原有名称为好。当然,对于具体的瓷器产品,可以完全不用“窑系”来命名,如对一件器物,抽象的说这是“磁州窑系”的作品,可以不这样称呼,可以称之为“磁州窑类型”、“磁州窑型”作品。我认为,用“磁州窑类型”、“磁州窑型”称呼不是磁州窑烧造但具有磁州窑装饰风格的器物是较为合适的。

注释:

- [1] (明)曹昭:《格古要论》,明洪武二十年。
- [2]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河北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
- [3] 《金史》卷五五。
- [4]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第二十三。
- [5] (元)陶宗仪:《说郛》卷三〇下。
- [6] (元)刘祁:《归潜志》卷一。
- [7] (明)陈眉公:《妮古录》。
- [8] (南宋)《乾道临安志·卷二》。
- [9] 《白与黑的魅力:中国磁州窑磁器的演变》第2部图85、图148,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2002年。
- [10] 《白与黑的魅力:中国磁州窑磁器的演变》第1部图26,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2002年。
- [11]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安徽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
- [12] 《明宣宗实录》。
- [13] 《明会典》卷一五七,弘治十五年成书,正德四年重刊本。

- [14] 《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 [15] 《山西通志》卷一八七，清雍正十二年。
- [16]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八八《工部》。
- [17] 《金史》卷二五。
- [18] 《明一统志》卷二八《彰德府》，天顺五年。
- [19] 《明会典》卷一七。
- [20] 《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二一。
- [21] (明嘉靖)《彰德府志》卷三，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
- [22] (清乾隆)《畿辅通志》卷五七。
- [23] (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二。
- [24] 刘毅：《朝鲜时期的粉青沙器初探》，《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
- [25] 郭学雷：《明代磁州窑瓷器》，文物出版社，2005年。
- [26] 陆明华：《元青花瓷器研究概况及相关问题》，《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